

《與談》

期待中間勢力阻擋不自由的民主

◎南方朔

儘管我們常把「自由民主」當作口頭禪，事實上「自由」與「民主」乃是完全不同的範疇，舉凡有了民主選舉的形成要件，但內容要件上都欠缺的，即可稱之為「不自由的民主」(illiberal democracy)。而在另一個意義上，它也等於是一種「器量偏狹的民主」。那麼什麼樣的民主是「不自由的民主」呢？

像十九世紀歐美民主初期的排他性政黨（如美國人的美國人黨），或者多以煽動人民內部矛盾而起家的「凱撒式政客」皆屬之；而在其中，搞所謂的「誰是真正的德國人」，「誰是真正的法國人」這種所謂的「起源之原始崇拜」(Occultism of Originality) 最為典型。這種政治以煽起差別、黨同伐異為內容，而不以客觀化的理性決策與行政為內容，因

而諸如貪贓枉法者仍然繼續。而黨同伐異的無限發展所造成的，即是社會被無限制切割撕裂，當然也造成「只問立場，不問是非」的價值錯亂，這種民主也可稱「部落型的民主」或「煽動式的民主」。

像近代許多「好戰式的民主」亦屬之。它以不斷的對外挑釁所造成的張力，作為鞏固內部權力的手段。甚至將對外好戰與對內分化合流，而成為無往不利的之政治工具。

此刻的台灣政治，可以說即走在這樣的方向上，由於政治已被拉高到所謂的「敵我矛盾」的層次，因而各式各樣的不擇手段都已可公然大行，既無羞愧不安，也不會受到指責。當台灣已被如此嚴重的撕裂，恨意孳長，而且被無限制放大，台灣做為一個「社會」的條件是否依然存在，已的確值得懷疑。同時，除了內部撕裂加大，恨意孳長外，經由這次選舉，還有若干嚴重的後遺症被留存了下來，其犖犖大者，計有：

其一，乃是過去長期以來，台灣一向把選舉視為一切倫理、責任、以及所有規範的「假期」，而後我們會說：「啊，這一切都是選舉語言，不必介意啦！」在這種邏輯下，台灣的政治人物不必言行合一，不必為所說的話負責，可以今天這樣說，明天又那樣說，養成了一種惡習。美國重要詩人奧登曾說過：「當語言失去了意義，赤裸裸的權力遂統治一切。」由於政治人物在語言上不必負責，再加上邏輯上的多重標準，經由這次選舉，台灣

不但已出現政治人物的人格危機，更出現被信任危機。尤其是有關公投之事，反覆顛倒，而後向美國傳達出「不要看我說的，要看我當選後所做的」，這等於是稱台灣言行可以分離，可以不必為所說的負責，這種價值錯亂，公開到了外國人的面前，而使得台灣的國際形象被大大塗汙。所有的這些現象，它所透露出來的，乃是對台灣的政治人物而言，除了權力之外，再也沒有任何東西是重要的，這種唯權力的虛無主義，對台灣的人們仍是一種極為惡劣的示範。

其二，則是由於權力才是重要的，為了權力而不擇手段的競爭，當然對台灣的整體環境造成極大傷害。台灣為了選舉，而將財政做為手段，各類大規模的選舉支票，各種大規模的政商交換與利益輸送，已造成國庫債務的大幅增加。這種財政上的定時炸彈，將來不論任何一方獲勝，都有可能在不特定的時間被引發。

其三，乃是這次大選，由於它被刻意的動員，以及被各式各樣的言辭所硬拗、所刺激，在「中國人—台灣人」，「南部—北部」，「台北—台灣」等層層切割下，台灣已不再有任何公約數，往後甚至會出現換一個政府即換一套教科書，或換一套歷史、語言及文化的策略。當一個社會淪於這樣的情境，它的「不可統治性」其實已日趨擴大，當情況有所改變，更大的變動未嘗沒有可能出現。

也正基於此，面對這樣的情勢，由西方所走過的路，已顯示出它必須要有足夠力量的中間勢力來加以阻擋了。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在持續不斷的泛政治化、泛敵我化、泛權力化之下長存。我們當然對政治人物應有所期許，要求他們恢復起碼的格調，但在台灣的現況下，這卻顯然難以企及，這時候，其他各業的菁英，也就不宜再保持緘默。德國文豪湯瑪士·曼曾感慨的說過：「現實政治只和很少的人有關，但它卻可能毀掉全部人的生活。」他當年所發的喟嘆，對此刻的台灣應具有一定程度的啟發意義！